

第三节	旅游区的水景观设计	103
第四节	水环境景区的选址设计与布局	104
第五节	亲水景观的标志物——桥	108
第六节	气口、水口和景区大门的选址设计	111
<b>第九章</b>	<b>地方历史文化的旅游景观与项目设计</b>	<b>114</b>
第一节	成功的景区规划须主题鲜明	114
第二节	“生命河”与文脉节点的历史进程	116
第三节	地方文脉传承的大本营——学校与书院	117
第四节	地方文脉的标志物——塔	119
第五节	唱响一曲反映山川灵气与地方风情的歌	125
<b>下编 景区文脉分析与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案例</b>		
<b>第十章</b>	<b>北京城的地方文脉</b>	<b>129</b>
第一节	东方广场遗址的文脉启示	129
第二节	元大都文脉——大哉乾元的《周易》国都实体	136
第三节	从象、数、义、理看明清紫禁城“世界之中”的规划布局	147
<b>第十一章</b>	<b>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旅游景区文脉</b>	<b>153</b>
第一节	景区文脉分析	153
第二节	克什克腾旗旅游空间总体布局	156
第三节	达来诺尔湖生态旅游区概念性土地利用规划	158
第四节	乌兰布统旅游度假区概念性土地利用规划	162
第五节	阿斯哈图石林生态旅游区概念性土地利用规划	165
第六节	青山冰臼公园生态旅游区概念性土地利用规划	167
第七节	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概念性土地利用规划	170
第八节	敖包祭祀活动	172

# 目 录

Mou Du

<b>第十二章</b>	<b>河南滎池仰韶大峡谷的地方文脉与景观设计</b>	178
第一节	仰韶大峡谷旅游规划的意义与思路	178
第二节	景区文脉分析与开发目标	181
第三节	景区文脉定位与品牌形象设计	184
第四节	文脉与景观景点设计	187
第五节	空间布局与旅游线路组织	193
<b>第十三章</b>	<b>武夷山文脉与武夷山市文化旅游产品规划</b>	196
第一节	武夷山文脉分析	196
第二节	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199
第三节	发展文化旅游的对策及产品开发	201
第四节	古村落及民俗旅游产品开发	203
第五节	当代新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206
第六节	宗教旅游产品开发	207
第七节	朱子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215
第八节	武夷岩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219
第九节	柳永歌舞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222
<b>第十四章</b>	<b>和而不同的春城旅游文脉</b>	226
第一节	昆明旅游圈产业定位与发展目标	226
第二节	昆明旅游圈形象定位	227
第三节	昆明旅游圈产品开发战略	238
<b>第十五章</b>	<b>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金平文脉</b>	243
第一节	金平县旅游发展的文脉	243
第二节	金平旅游形象塑造	252
<b>第十六章</b>	<b>塑造云南省弥勒县的“佛城”旅游形象</b>	
	——旅游规划中主题思想定位的继承与创新	255



第一节	弥勒——龙潭清澈、温泉碧玉的仙境佛国	255
第二节	“佛城”名称与地名问题	258
第三节	弥勒县旅游总体规划	259
第四节	景区详细规划方案	266
<b>第十七章</b>	<b>中老边境口岸新镇——磨憨文脉</b>	<b>272</b>
第一节	磨憨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272
第二节	规划目标、城镇结构和整体布局	276
第三节	旅游城镇人口及用地规划	278
第四节	磨憨镇形象设计	284
<b>第十八章</b>	<b>千年福地世界桥城与慈溪市旅游形象</b>	<b>288</b>
第一节	慈溪市旅游形象定位	288
第二节	旅游形象视觉识别(VI)系统	290
第三节	慈溪市旅游分区规划	291
<b>第十九章</b>	<b>山东枣庄“冠世榴园”的旅游发展与地方文脉</b>	<b>294</b>
第一节	冠世榴园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294
第二节	石榴的生态文化及旅游开发	296
第三节	冠世榴园与千年青檀林结合的旅游景观意义	297
第四节	冠世榴园的主题思想定位与旅游形象策划	298
<b>后 记</b>		<b>300</b>



##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次界定了地方文脉的定义,论述了地方文脉的系统理论,并将地方文脉原理的应用作为旅游规划的一门创造性艺术加以系统地阐释。内容包括3编19章,涉及地方文脉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山水大地的文脉分析、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以及旅游规划的主题思想与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等。并以生动的规划实践为基础,列举北京、内蒙古、河南、福建、云南、浙江、山东等地的10个实际景区案例,说明地方文脉原理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图文并茂,知识性、可读性和启发性强。可供各地政府旅游部门主管干部、专业旅游工作者、旅游规划师,以及旅游专业、建筑规划专业、风景园林设计专业师生参考,也可供旅游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规划的艺术：地方文脉原理及应用/于希贤等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

ISBN 7-5366-7066-4

I. 旅... II. 于... III. 旅游经济—经济规划  
IV. F5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031 号

 旅游规划的艺术

——地方文脉原理及应用

于希贤 于 涌 黄建军 等著

---

责任编辑 叶麟伟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张 进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19.75

字数324千字 插页2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

ISBN 7-5366-7066-4/F·345

定价：30.00元

## 下编

### 景区文脉分析与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案例

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发掘本地异于其他地方的独特之点，找到地方的个性，理清文脉，是地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成功的旅游规划，就是要在自然旅游资源与社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在可视性物质景观与无形的精神文化旅游资源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并将之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打造出地方旅游品牌。

本编用各章案例来说明：用文脉原理规划布局旅游景区，是我们的追求；展现个性、挺起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脊梁，是我们的愿望。





## 第十章 北京城的地方文脉



### 第一节 东方广场遗址的文脉启示

北京城是东方文明的伟大象征,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研究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首先需要确定这个城市最早的城址,然后才能进而探讨这个城市之所以在这一城址上发展来的原因。那么,这座古老而伟大的北京城,最早是萌芽于何地?又是什么时间开始出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请看以下分析。

#### 一、两万多年前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1996年12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岳升阳在北京市区王府井东方广场距地表12米处一侧黄色砂土层壁中发现了黑炭层。其中有些碎骨,碎骨中有的有火烧过的痕迹。他还找到了好几块人工打制的燧石片。此外,他还发现了三四个灰坑,发现了石核、石片、石器、木炭、烧骨(用火的遗迹)和动物骨骼化石多种。他的发现经考古工作者、古脊椎与古人类工作者、地理工作者以及著名专家、院士,如郁金城、苏天钧、徐钦琦、俞伟超、吕遵谔、徐苹芳、刘东生、贾兰坡、侯仁之等所证实。这的确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它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曾两度离开了山区和山洞,来到平原深处现今的东方广场一带生息。文化遗址的分布面积达200~

1 000 平方米。这里是迄今找到的北京城区最早的一处人类居住遗址。可以推断,它是北京城区人类居址的最早萌发地之一。

岳升阳发现王府井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这一发现把北京城古都的人类居住历史从 3 000 多年,推进到 22 000 多年。这项成果被北京市科协主席、前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誉为“北京大学 1996 年五大科学贡献之一”。岳升阳还受到国家文物局的表彰。这一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对北京市的城市历史研究有重大贡献。

当前北京城的科学发展迫切需要对北京城区地下遗存加深了解。岳升阳的发现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唤起民众了解史前北京的欲望。将过去几十年对北京城的科学研究成果积累、整合起来,便使北京城史前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的发现和已经卓有成效地介入北京旧城改造的理论与方法之中。

## 二、北京城最早起源的时间与地点追溯

有关北京城最早的出现,《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史记·乐记》中又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那么“武王克殷”为何年?《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商,东面而迎岁……岁星出。”经现代考证,这里所说的岁星就是哈雷慧星。经过历史、考古、天文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反复研究,终于得出了比较趋于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公元前 1045 年,距今(2005 年)约 3 050 年前,为北京城建城之始。

关于北京城最早的城址,学术界有多种不同意见。侯仁之首先提出与古代永定河和莲花池水系的广安门一带有关(图 10-1)。其核心理论认为,古代蓟城选址在蓟丘之阳的倾斜平原地区。随着古代永定河的冲积改道,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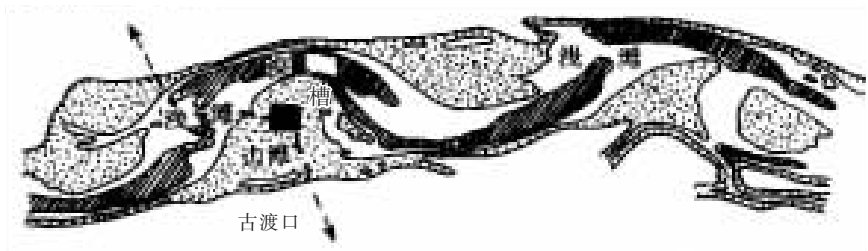


图 10-1 东方广场古河道及古渡口(图中箭头方向为渡行方向)

可能有移动,但没有离开过古永定河和这一平原的范围。后经苏天钧积数十年考古发现的重要资料,进一步证实在这一平原范围内有属于春秋、战国及汉代的许多陶井和遗物。“发现 151 座陶井,分布于会城门村直至宣武门豁口一带。陶井群最密集的地方是白云观以西,有 130 座。最密处 6 平方米内,重叠达 4 口井之多。在白云观附近施工时还发现春秋以前的建筑遗物。这一带的高台地被推断为古之蓟丘。当时古永定河流经其旁。”

### 三、蓟城出现之前原始居住区的探寻

在研究北京城起源的问题上,大家都有共识,即蓟城始封之前,城址上已有居民聚落,即先燕文化。在平谷韩庄、刘家河,昌平雪山村沿太行山、军都山麓一带,都有蓟城始封前的商代甚至是先商时期的遗址遗物。侯仁之先生提出:“北京原始聚落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在它最初的城址上,当已有一个居民点的存在。”那么,最初生活在北京城的居民点和聚落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最早在今北京城这块小平原上,人们是居住在哪里呢?一句话,就是要追本溯源找到人类播撒在北京城平原上最早居住的那一粒种子,并进而研究:当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地址,这和北京城后来的出现和成长有什么关系,从中探寻北京城最早的居民居住的遗址;研究北京城从这一小小的种子开始萌发,经过多次的轮回、沧桑的变迁,终于成长、壮大、发展以至于形成今日面貌的整个过程,也即从城市学的角度研究北京城的人地系统(man and earth information system)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对于深化认识今天的北京城,以及对今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

北京市郊的西南山区,离城约 50 千米的周口店龙骨山洞穴里,发现了 65 万~20 万年前的“周口店猿人”、10 多万年前的“新洞人”和 3 万~1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此后,在北京山区又发现了约 9 000 年前的“东湖林人”以及 8 000~6 000 年前平谷县“上宅的人类遗址”。这是在一个国家首都郊区所发现的古人类演化遗迹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种类较为齐全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环扣一环的史迹,这在全世界国都城市中也是十分独特的。

这些发现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山区和半山区。过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迹在北京的延庆、平谷、怀柔等山区曾有发现,它们和北京城区原始居民地的出现,推想可能是会有一定关系的。但这些遗址和周口店距北京城的距离,都在 50 千米以上,如果古人类不离开山洞居住过夜的话,一天之内是无

法往返于山洞与王府井之间的。古人类是什么时候从山洞走向平原的?这一直是科学界需要弄清的一个难题。这次岳升阳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北京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空白,也为当时环境变迁与人类进化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为北京城内人类活动的最早萌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证明2万多年以前,人们已经有能力在北京小平原居住生活了。

岳升阳等在野外还发现,此古文化遗址是两层。上层文化遗址距地表约11米,发现有1个灰坑,文化层厚仅1厘米。下层文化遗址距地表12米,文化层厚约2~4厘米,有3个灰坑。这一发现为地层专家袁宝印、夏正楷的研究所证实(图10-2)。经郑公望用热释光方法测得下文化层的时代距今2.2万~2.6万年,上文化层距今1.5万~1.9万年;陈铁梅用 $^{14}\text{C}$ 方法测得下文化层约距今2.2万年( $\pm 1000$ 年),上文化层距今1.8万年( $\pm 1000$ 年)。这就是说,人类曾相隔几千年间两次从山上下来,两次都来到东方广场生活,并在此留下生活的遗迹。

在温暖多雨的时代,人类都住在山上洞穴中。在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发现之前,国内外风行一时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离开山区,不可能生活在平原深处的。所以,当岳升阳在东方广场发现古人类遗址之初,人们一度依据国内外教科书的上述意见而产生怀疑,提出“这不可能!”甚至提出“这是否是河水从山上冲刷下来的?”但经许多专家到现场反复验证证明,这确实是一处原生的古人类居住遗址。最后,贾兰坡院士得出结论认为,它填补了北京平原地区从未发现过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是古人类在平原活动的有力证据。为研究北京城市史和古人类在洞穴与平原生活活动的轨迹,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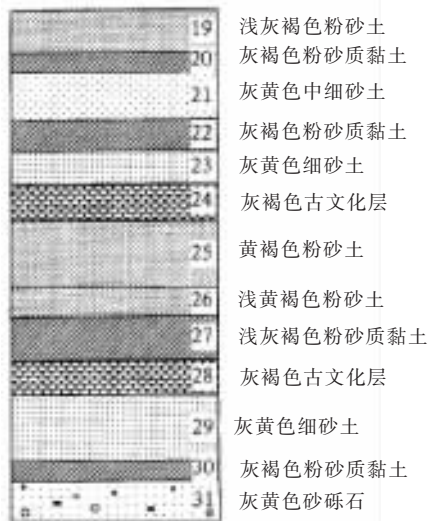


图 10-2 东方广场基址地层剖面图  
(据夏正楷剖面图)

#### 四、气候的突变与人类进化的突变

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有变化的。有渐进的变化，也有突变。玉木冰后期，有两次寒冷的低温阶段，分别出现在距今 2.2 万年和距今 1.7 万年前后。那时气候寒冷而干旱，北京平原的花粉组合以蒿、莎、禾本科的花粉为主，为干旱性草原植被。形成的沉积物是北京山区和城区易见的几米厚的灰黄色土，即马兰黄土，或其再搬运沉积物质。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年气温约比今北京平原可能低 7℃ 左右。就恰巧在这时，干旱而寒冷的气候使先前住在山洞、山区的人类难以找到水源和食物，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山区，沿古永定河，逐水草、猎物而居，来到平原深处，在河湾处捕猎动物为食。古人类曾因生存食物来源的所需，在气候变干变寒的时期，追逐动物群，起码有两次轮回下山至东方广场居住。即便是短期甚至是季节性的居住，他们也是北京城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

寒冷干旱气候，引起山区食物来源困难，是一种残酷的挑战，也迫使当时的古人类改变生活环境，改进劳动工具。这一次岳升阳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其生产工具——石器都很小，主要是用细小的石叶加工成的。目的是把这一片片石叶镶嵌在骨、角、木柄上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它把骨和角的柄刻出沟槽，把若干把石叶刀片接连镶嵌到沟槽里，产生如刀似锯的功能。这次发现的长薄石叶，断面呈平凸三角形，背面上有一条纵脊。其宽和长之比近 1:10，厚和长之比则接近 1:20。其石质为玛瑙，原料产地从北、西、东三个方向都起码超过了 100 千米以上。

自然环境骤变，从山洞走进平原，细石器代替了过去粗大的打制石器，北京城最早人类居住遗址的出现，这四者表现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古人类遗址中，是同步发生的。这也表明了气候突变、人类进化和北京城人类居址出现的相互关系。最早来到北京城中心区的居民，是环境与气候剧变的产物，是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人类划时代飞跃进步的一种表现。

#### 五、“三海大河”——北京城的母亲河

##### (一) 洪积、冲积扇的山前平台与北京城的选址

古人类最早来到北京城区居住，很可能是季节性、临时性、间歇性的。所以，东方广场地下 12 米、11 米两层文化遗址的文化层都很薄。那一时代的人们，从住在山区、山洞，来到平原河边居住，又是轮回性的。虽然经过了几

千年的时间,只要河流的自然环境大致依旧,动物群的活动范围大致如故,人们追捕猎物的方法相似,那么人们居住区的选择就大体相沿而变化不大。在世界上,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现相隔几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还是一桩很罕见的事。这一人类到北京城最早的居住地,在2万多年以后,又成为东方文明之都的心脏地区。在发现了古人类遗址之后,我们随着东方广场施工的进度,地层一层层向下开挖,这一区域下层还不断有大批野生动物骨骼化石出土,如大象骨、野水牛骨等大型野生动物的化石出土。也就是说,在古人类到此居住之前,这里就是野生哺乳动物悠游群居的良好场所。这几次文化轮回的相同选址,决非偶然。

要弄清为什么几次文化轮回选址都以东方广场这一地理区位为中心的秘密,就要研究古代抚育北京城成长的“三海大河”——古代的永定河,以及这条古河沉积所形成的地形。

这条古永定河形成了一个冲积扇。它以西山山口的石景山一带为顶点向东北方、东方和东南方这三个方向呈辐射状倾斜。古老的北京城就坐落在海拔高度大约30~50米之间的更新世的山前平原之上(图10-3)。有的也称这里为古永定河冲积扇构成的山前倾斜平原(夏正楷),或称山前台地(侯仁之)。古人之所以做出这一城址的选择,是因为这里处于永定河冲积扇山前倾斜平原的中轴部位,这里的地形,相对比南北两方较高,可以避开位于城南的永定河涨水泛滥所造成的直接威胁。这里地势开阔平整。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迫切需要城市供水,元代开始把先前永定河故道上的“牛轭湖”——什刹海、北海和中海纳入城市的中心区,作为城市用水和宫廷园林的水源。元代一度利用这条水系与南北大运河相连,使漕运的南粮和货物直抵城内中心区,从而使“三海大河”这一古永定河故道发挥了多功能效益。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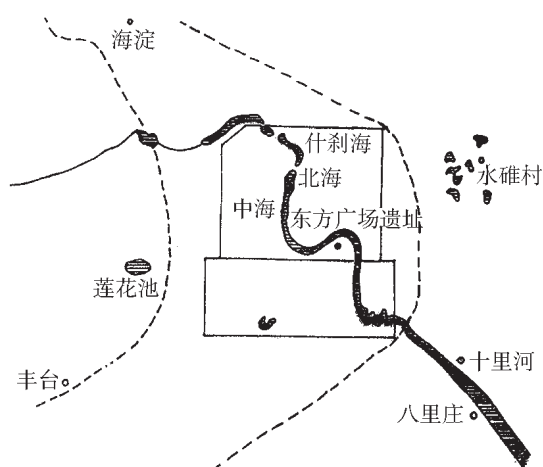


图 10-3 北京城坐落在更新世山前平原上

一合理的地形选择和“三海大河”的巧妙利用,是北京城成为世界著名古都的成功条件之一。

“三海大河”是在距今约3万年至2000年前,大约流经了2万多年的一条古河道。此古永定河是一主干道。它出磨石口,由石景山、衙门口东流,沿八宝山北侧转向东北,经田村、紫竹院,由德胜门附近入城,形成两个大湾。这两个大湾是如何形成的呢?原来古永定河流过50米等高线之后,从冲积扇进入山前倾斜平原,遇一坡降较大的陡坡,使水流速度加急,过了陡坡后水的流速变平稳,而在河道转弯处形成什刹海、北海和中海的“牛軋湖”,为第一大湾。此后古永定河东流经过东方广场然后南转形成第二大湾。这一大湾是前一大湾的回流。这两个大湾反映了长期以来北京城中心地带地势相当平缓。此后古永定河经今北京火车站、龙潭湖、贾家花园流出城外,经十里河、八里庄至马驹桥流向东南。

“三海大河”在金代成为北京城外著名的“琼华岛”风景名胜地。金元之际,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在此布道。三国时期曹植曾到此,有诗记录了当时湖、池、桑的自然环境状况。

### (二) 东方广场古遗址保存在“三海大河”转弯的内侧

发现东方广场古遗址的地点,就位于“三海大河”第二转弯的内侧位置上(图10-4)。从施工打开的地下剖面,看到河流长期在此转弯使得地层层理不断尖灭的痕迹,透镜体一层又一层,使沙层互相重叠。如古文化层下部的灰褐色粉砂质黏土、灰黄色细砂土,其上的浅灰褐色粉砂质黏土、浅黄色粉砂土、黄褐色粉砂土以及上层文化层之上的灰黄色细砂土、灰褐色粉砂质黏土等都在附近不断尖灭。各地层透镜体当中,小树枝特别多。反映了古遗址是存留在当时大河的急转弯内侧。



图10-4 古遗址在大河转弯内侧

### (三) 古河道转弯处的河漫滩与古遗骨保存的条件

古遗址中发现野牛、鹿、鸵鸟、兔子和小鸟的骨烧化石,其中有因人为敲打而破裂的痕迹。还有4个灰坑,呈五色土状。这是当时的火塘。其中有当

时燃烧的炭粒。这些东西要是在露天氧化环境很好的条件下,不用几天或几十天就会腐烂无形。

那么,这些骨头、炭粒和灰坑是怎么会不被氧化、腐烂而保存下来的呢?经初步测定,“三海大河”在附近宽 200 米左右。遗址在这条大河转弯内侧的河漫滩上,现在发掘出来的烧骨和动物骨骼上都有一层细小而发亮的云母砂层。它是“三海大河”突然涨水由河水冲来沉淀在古人类遗物之上的。是这一云母层附着在其上隔离了氧气和细菌对遗物的腐蚀,方便它们保留到今天。

古人选择的河湾内侧,是野兽必来饮水之地,加之三面环河,这里易于围捕野兽。捕获之后,就地起火而食。或遇大雨,河流涨水,人们也就另迁他处了。古永定河渡口,成为最早的北京城址的诞生地和最早的北京人类居址的诞生地。这里又是联络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及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这五大经济文化板块的中枢及纽带。所以这里成为辽、金、元、明、清及现在建都之地,也就合乎时代运势了。象征着东方文明的古都——北京,她的文明与繁荣是立足于 2 万多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壤根基之上的。天安门、王府井东方广场是首都的心脏地段,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北京城这块城区中心的土地上,文脉传承最早的历史迄今已经有 2 万多年了。

## 第二节 元大都文脉

### ——大哉乾元的《周易》国都实体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最高理论思维,就是《周易》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学说。中华民族到了元代,已经把自己民族的理论思维,规划建设成了自己的国都。

元大都是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剖析研究它的文脉,有助于认识文化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它是由元人刘秉忠、虞集规划设计而建成的(图 10-5)。

#### 一、刘秉忠、虞集的学术思想及其渊源

元大都的最初规划、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史·刘秉忠传》说:“中统四年(公元 1263 年)又命刘秉忠筑中都城。”“至元元年(公元 1264 年)刘秉忠请定都于燕,主从之。诏营城池及宫室,乃号中都。”“元世祖定大兴为大都,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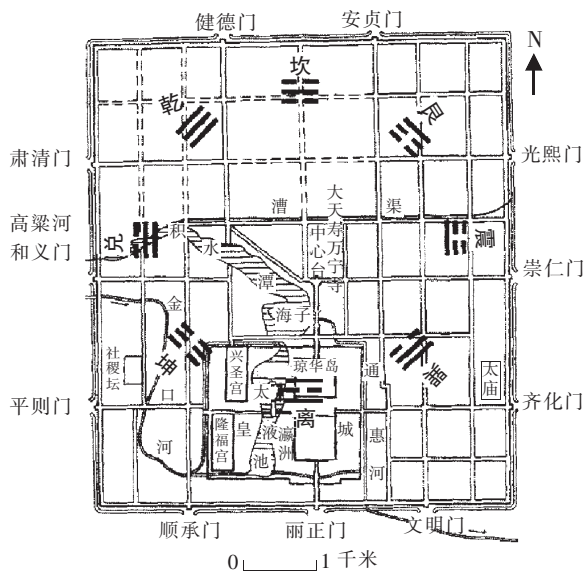


图 10-5 元大都城的城门依文王八卦方位排

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迨北草青，驾幸上都避暑……八月草将枯，忠则驾回大都。”

刘秉忠(1216—1274年)，元代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字仲晦。初名侃，少时为僧，名子聪。号藏春散人。“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8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他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到他这一代已家道中落。少年时，他曾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这样，他就入武安山天宁寺为僧。因此，《元史》说他“因从释氏，又名子聪。”而藏春散人又是道士的道号。“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这是他内心道教神仙思想的反映。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遂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掌”。刘秉忠尤为推崇、精心研究的《周易》为儒家群经之首。而“邵氏《经世书》”，即北宋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所著的推演世事变幻的《皇极经世》，它是邵雍据《易传》关于八卦的原理，用道家的思想提出的关于宇宙构造图式的学术体系，为其代表作。邵雍的学问，于“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以天道质人事，辞约而义广”，为“内圣外王之学”，“以观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古而今世变”。邵雍是一个“老氏之徒也”。由此看来，刘秉忠身为和尚，心向道家，思想深处又为儒家，一身兼儒、道、佛

三者,尤其是能熟练地运用《周易》和邵雍《皇极经世》中的“阴阳术数”来推演天人关系。他是一位用儒家出世济民的思想而一统佛、道之治心、修身、推理、观天下的谋士。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着一整套“吾从周”的思想渊源。刘秉忠正是将这一套奠基于西周初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用之于元大都的规划布局,使都城结构与政治体制系统相结合,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改造当时游牧民族的蒙古统治者。他提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他大力倡导文治,以儒家的思想治国,以道家的思维方式观察与处理天地人生、人与自然的关系,用佛家释老思想治心。他提出政治家要以西周周公为表率,“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曾上书千言说:“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用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他又说:“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和天地之气,顺时序之行。”

刘秉忠醉心于儒、道、佛思想,尤精于阴阳术数,必然反映在他主持规划设计的元大都形体之中。很可惜,元大都还没有完全建成,刘秉忠就谢世了。继起的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秉承刘秉忠的思想,继续元大都的建城计划。《元史》本传说虞集“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他又仿邵雍,主修《元经世大典》八百帙。虞集也是崇拜邵雍的,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右室书邵尧夫(雍)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所以,刘秉忠、虞集都把邵雍的思想作为元大都的文化精髓。

## 二、儒家“周王礼制”在元大都的反映

### (一)“周王礼制”与元大都

在国家观念上,“大一统”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为“天地之经常,古今之通宜”。所以,刘秉忠根据《周易》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圆也”而取国号为“大元”。这就是国家观念上的大一统含义。他又据《周易》中“至哉,乾元”,“至哉,坤元”的含义,建议忽必烈立年号为“至元”。以此为传统,后来的年号“至正”也来自《周易》中“至正”:“乾道大,通而至正。”这即是《周易》的大一统观念和“周王礼制”思想在建国方略上的突出反映。

“周王礼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蓝图,也集中表现在元大都的规划布局